

新时期

小说创作潮流研究

■
邝邦洪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彦辉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研究

邝邦洪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 - 218 - 02501 - 3 / I · 308

定价：1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陈其光

邝邦洪同志是我廿多年前教过的学生，毕业留校任助教后是我的同事，同在一个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他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在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上都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现今，他是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看到他的进步和成就，作为他的老师，我深为高兴。现在，他的第三部专著《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研究》，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请我作序，欣然应允。

这本专著，从总体的布局看，其覆盖面和涵容性相当广泛。可以说，已涉及到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中许多基本的和重要的方方面面。细读全书，我认为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作者坚持从美学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出发，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及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风起云涌，举世瞩目；新时期艺术流派层出不穷，变幻莫测。出现了与前30年迥然不同的文艺倾向和创作潮流，呈现出繁荣与混乱共生、生机与危机同在的局面，给人万紫千红、眼花缭乱之感。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按照特定的时间、环境及对立统一规律运行的矛盾运动过程。有主流，就有支流，同时

也会有回流、甚至逆流。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紧扣社会政治环境与文艺思潮，把小说创作潮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范围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引导人们对这些纷繁现象和复杂状况进行具体的梳理、深刻的反思和中肯的评价。

其次，作者注重从整体性、系统性以及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概括和阐释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的成因、变化、矛盾冲突、是非得失、社会效果及其历史意义。全书共6章29节，对新时期以来文坛上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以及“新写实小说”等小说创作潮流和文学发展态势，作了鸟瞰的概述和微观的缕析。尤其是作者面对浩如烟海的新时期小说创作及汗牛充栋似的文学评论，既不受过去的“定调”所束缚，又不采取回避敏感问题去保守研究，而在参考不同评价和不同论争的基础上，大胆地以学术自主意识和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作者占教学、科研之利，从70年代到90年代，穷廿载之积累，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用教学印证和深化科研成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起点的中国当代文学，将近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了。40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历经坎坷曲折，饱经风雨沧桑。作者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实践，既能系统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又能敏锐地掌握中国当代文学动态信息。两者结合，既为作者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涌现的种种风格流派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原始资料，又给作者从比较中较为准确地阐述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形形色色潮流的成败得失。实践证

明：这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既可丰富教科书的内容，又可深化专业研究的成果；既让学生系统地接受本专业的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又可为学生提供文坛上的新信息、新思潮、新成果以及新方法。

第四，本书突出“史”的特色。全书从新时期“伤痕文学”创作源头谈起，纵观近20年间涌现的五花八门的小说创作潮流，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小说创作种种潮流寻根溯源，并结合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进行分析论证。观点鲜明，史料翔实，条理清晰，论证合理，既有学术性，又具有“史”的明显特色。

邦洪同志在高校双肩挑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
作，个中艰辛，众所周知。为了完成专著的撰写，作者以惊人的毅力和意志，起五更、睡半夜，费时数载爱成此书。作为长辈，看到年青一代已成长，我由衷深感欣慰；更为邦洪《新时期小说创作潮流研究》的即将问世表示庆贺！

1997年7月于华南师范大学

(本文作者：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组组长、广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第一章 伤痕文学创作潮流	1
第一节 伤痕文学的兴起	1
第二节 伤痕文学反映的“外伤”与“内伤”	6
第三节 伤痕文学的人物形象	13
第四节 伤痕文学的艺术特色	23
第五节 伤痕文学的论争概况	29
第六节 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	34
第二章 反思文学创作潮流	37
第一节 反思文学的出现	37
第二节 当代历史的重新审视	40
第三节 反思文学的人物形象	53
第四节 反思文学的艺术特色	65
第五节 反思文学的历史价值	72
第三章 改革文学创作潮流	74
第一节 改革文学兴起的原因	74
第二节 社会变革的真实反映	76
第三节 改革文学的人物形象	84

第四节	改革文学的艺术特色	97
第五节	改革文学的新贡献	101
第四章	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潮流	104
第一节	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出现的原因	104
第二节	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的发展	108
第三节	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的艺术借鉴	111
第四节	借鉴现代派表现手法的理由	126
第五节	对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的评价	132
第五章	寻根文学创作潮流	136
第一节	寻根文学出现的原因	136
第二节	寻根文学的类型	141
第三节	寻根文学的艺术特色	159
第四节	寻根文学的争议与评价	166
第六章	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	170
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出现的原因	171
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的艺术特征	173
第三节	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	178
第四节	新写实小说的争议与评价	194
后 记	199

第一章 伤痕文学创作潮流

伤痕文学出现于 1977 年末，于 1978 年形成一股创作潮流，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以后。这股伤痕文学创作潮流虽然距今已近 20 年，但是，今后任何一位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史家，都无法否认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深刻起点，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伤痕文学的兴起

1977 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第 11 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出现的一篇深刻揭露“四人帮”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给广大青少年的心灵造成严重创伤的作品，开伤痕文学的先河。这篇小说的突出贡献是作者经过对生活认真思考之后，勇敢地向社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一声呐喊，震动了文坛，震动了社会。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报》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

简单，但它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幕悲剧。作品叙写上海女知青王晓华 16 岁时瞒着被“四人帮”打成“叛徒”的母亲到渤海湾插队，并从此断绝了与家庭的联系。她真诚地认为与母亲划清界线，就是革命的。她在农村埋头苦干，政治上要求进步，但她的入团申请却因家庭问题未被批准。她获得了苏小林真挚的爱情，小苏却因此而失去了调干机会。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母亲的“叛徒”问题真相大白，这竟是一宗冤案。她怀着“激动”与“难过”的心情回上海看望病重垂危的母亲，但母亲已等不到女儿归来而带着难以平复的伤痕而去世了。为此，王晓华只能在亡母灵前哭诉：“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这是两代人的伤痕，两代人的悲剧。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千方百计寻找登载这篇小说的报刊。不少读者边读作品边流泪。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篇小说，会觉得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显得有些稚嫩和粗糙。但是，由于这篇小说较早地涉及了知识青年的命运，老干部的冤案，两代人的隔阂，道德观上的变态等等，尤其是作者能通过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屡见不鲜的社会悲剧，以颇犀利的笔锋剖析了封建的“血统论”、法西斯的“株连法”、荒谬的愚民政策和庸人的社会舆论等，迫使人性裂变、道德沦丧、家败人亡的残酷性。因此，这篇小说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巨震，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

《班主任》、《伤痕》的出现，深深震撼着全社会的心灵，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于是文学界把这一类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于是伤痕文学这一新概念在历史上出现了。此后，伤痕小说大量出现，形成了一股伤痕文学的创作潮流。其

代表作就有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等短篇小说。还有谌容的《永远是春天》，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泥泞》，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等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正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给人民群众造成严重的外伤和内伤。

伤痕文学之所以会兴起，会形成一股创作潮流，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为作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从国家主席、党的领袖人物，到普通老百姓，受难者数以万计。个人的和家庭的悲剧，在人们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尤其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10年间所散播的思想流毒就像一场瘟疫的病菌一样，已经蔓延到我国的各个角落，对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道德风尚造成了悲剧性的摧残和污染。一代人（特别是青少年）遭受了严重的内伤。”（冯牧：《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见《新时期文学的主流》第5页）这种使人触目惊心的客观现实，不能不使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拿起笔来声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控诉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二是创作主体有切身的体验和拥有丰富而厚实的生活积累。伤痕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青年作家。在他们之中，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就深受其害，切身饱尝了累累“伤痕”。冯骥才出身于一个大资本家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要受到冲击。有一天，“他被一帮‘破四旧’的红

卫兵截住，把他的头发剪得七零八落。他惊呆了，没有反抗，一言不发，径直赶回家”。家，被红卫兵抄了，“他所崇拜的文学艺术大师的画像被撕成碎片抛在地上。”“他那些心爱的藏书全被扔进了院里的火堆。”他的母亲也被红卫兵剃光了头发。面对风云变幻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生，冯骥才在思考：“为什么那些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抄家时会把屋里每一件完整的東西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为什么海河边几乎天天都有人投河自尽，甚至有的腰间还捆着婴儿一同殉难？为什么一个悬梁自尽的人蹬倒的凳面下留着很多徘徊不定的脚印……”（许志安：《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冯骥才的生活、创作道路》，见《中国当代文坛群星》第181页）。冯骥才的亲身经历，他的耳闻目睹，他的深沉思考，使他创作了《铺花的歧路》、《啊》等中篇小说。又如从维熙，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进过劳改队，在矿山、工厂、农场，干过各种苦力。在20多年的底层生活中，他饱尝了悲欢离合，历尽人间沧桑。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粪土与黄金，高洁和卑鄙，恶毒与善良，虚伪和真诚”。（从维熙：《答木令耆女士》，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470页）他看到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有才有识、正直清白的知识分子，在极“左”的政治风暴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投入监狱，枉作楚囚。这一切，是他创作的源泉，使他写下了《大墙下的红玉兰》、《泥泞》、《第十个弹孔》等中篇小说。还有莫应丰、周克芹、刘心武、卢新华、郑义、陈国凯等中青年作家，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但有一个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人生的艰辛与磨难，目睹了军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鲜血和死亡，看到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这为他们创作伤痕文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三是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了伤痕文学的迅速兴起。1976年秋，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中国人民从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大忧患中解脱出来。人们开始痛定思痛。“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当时刚刚出现就遇到很大压力的伤痕文学作品以有力支持，使人们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文学的唯一标准，从而把伤痕文学置于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给步履维艰的文学界以巨大的勇气和动力，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鼓舞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让思想冲破牢笼，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三中全会前后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生活素材，解放了生产力，更直接促进了伤痕文学的发展。”（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第303页）总之，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伤痕文学迅速兴起，形成一股创作潮流。

四是广大读者对伤痕文学的关注，也推动了伤痕文学的迅速兴起，这是伤痕文学潮流形成的共振原因。当《班主任》、《伤痕》、《我应该怎么办》、《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批伤痕小说出现的时候，广大读者热切地关注着，他们互相传阅着，他们边看边流泪，他们感到伤痕小说写出了他们的血和泪，喊出了他们的心声，于是，他们对文学充满着爱，把文学当作一桩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业来对待。读者呈现的真情，使广大作家深受感动。作家们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又辛勤耕耘，写出更动人的作品。

第二节 伤痕文学反映的“外伤”与“内伤”

伤痕文学是从描写人的伤痕开始的，它最先关注着人的悲惨遭遇和内心创伤。它通过描写不同人物的悲惨遭遇和内心创伤来揭示造成悲剧的原因，从而开掘深刻的思想意义。伤痕文学表现人的伤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人的蒙冤受难写出受害者的伤痕。“文化大革命”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敌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局面。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呼叫声中，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结果造成了冤案如山，蒙冤受难者留下了深深的带血的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葛翎，《将军吟》中的彭其、胡连生，《神圣的使命》中的白舜，《代价》中的徐克文等人物，都是蒙冤受难者，他们的不幸遭遇、道道伤痕，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葛翎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从朝鲜战场复员到省公安局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处长，在“文化大革命”大搞现代迷信的年代，由于他坚持真理，公开抵制错误的潮流，不拥护神化领袖，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遭到了老还乡团马玉麟和流氓集团分子俞大龙的虐待与迫害，最后惨遭枪杀。而坚持与人民为敌的老反革命、在押犯人马玉麟，因迫害葛翎有“功”提前释放。葛翎蒙冤受难的悲剧，形象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这特定的年代和环境

下，如何蜕变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严酷现实。兵团司令员彭其是参加过“浏阳共产”的老同志。他正派、耿直、忠于党的事业，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上一级党的会议上批评了吴法宪搞形式主义，用突出政治来反对军事训练的错误路线，结果被林彪反革命集团上纲为“反党”，被扣上了企图“夺空军权”的“野心家”的帽子，使这位蒙受不白之冤的将军挨批判，被围攻，遇绑架，受拷打，遭囚禁，备尝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一个指挥10万兵马、控制南中国大片领空的兵团司令员，旦夕之间不仅失去带领他的部队保卫祖国的权利，而且失去人的生存权利，几乎被邪恶势力折磨、迫害致死。彭其将军的蒙冤受难的遭遇，是所有正直的革命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这特定年代共同遭受劫难的典型反映，形象地反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大批革命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于是利用这场错误发动的“革命”推行其打倒一切的策略，清扫这些障碍。因此，彭其将军的命运，正是这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第二，写出人的命运的悲惨来揭露“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摧残迫害。在10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和个人都受到了冲击，遭到了摧残和迫害，尤其是一些女性命运十分悲惨，她们自身没有力量与邪恶势力抗衡，有的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结果仍然是悲惨的。如《我该怎么办》中的子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秀云，《月兰》中的月兰，都是备受屈辱的女性形象，她们各有一段悲剧性经历，都有心灵上的创伤。

技术员子君的命运是悲惨的。她的第一个丈夫李丽文，由于对“四人帮”及其同伙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大肆迫害干部

群众的罪行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抗议，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专案组组长冷冷地告诉她，李丽文“畏罪自杀”了。她那与世无争的姑妈也被打成潜伏“特务”，在“牛栏”里被折磨死了。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不能留在设计组工作了。白天，她要带上“反革命家属”的小牌扫马路，晚上要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她面对邪恶势力，无法抗争，她的心破碎了，在绝望中怀着尚未降生的胎儿去跳江。她被老同学刘亦民救起，3年后与刘亦民结了婚。1976年1月刘亦民因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捕入狱了。子君又一次沦为“反革命家属”。粉碎“四人帮”之后，子君的两个丈夫都出狱回家了。子君处于两难处境，发出了“天哪，我该怎么办”的呼喊。子君的悲惨命运，深刻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摧残和迫害。这一悲惨命运，让人们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给人的身心上造成的外伤和内伤，即使到了新时期也无法愈合。另一方面，子君的悲惨命运是由李丽文、姑妈、刘亦民的冤案所受牵连而造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封建时代的“灭族”、“灭门”、“满门抄斩”、“夷灭九族”等株连的刑罚，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泛滥，在制造人间悲剧。

许秀云是一位农村妇女，生活赋予她无比美丽的外貌和心灵，但在邪恶势力的摧残下，她的命运十分悲惨。许秀云正值青春年华之时，遭到花花公子郑百如的人身侮辱。她不得不下嫁郑百如，从此，她掉进了苦海，埋葬了青春，开始了悲剧性的经历。她做了母亲，孩子又不幸夭折。“文化大革命”中，郑百如造反，成了“英雄”，斗倒了许秀云的姐夫金东水，当上了党支部副书记，更加胡作非为，虐待许秀云，最后为求新欢，借口秀云与金东水关系暧昧与之离婚。许秀云在屈辱和痛

苦中，度过了8个春秋，离婚对于她，实在是精神上的一大解放。但是，“寡酒难吃，寡妇难当”，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压力。父亲不理解她，姐妹们也不谅解她。她只好忍受不幸，分家独自生活。当工作组进村后，郑百如怕许秀云揭露他在葫芦坝犯下的种种罪行，又百般威胁许秀云复婚。许秀云拒绝后，郑百如又诬陷许秀云与金东水通奸。许秀云忍无可忍，决心“敲开葫芦坝上每一个庄户人家的大门，去宣布郑百如的罪恶历史”，但是，乡亲们却把她当作“不吉利的女人”或“疯子”而拒之于门外。于是，她深深地感到，“姐妹们，乡亲们，还有工作组的同志，他们都把我当成仇人，当成坏人啦”，“生活向她关闭了所有的大门”。她失望了，于是，想到了死，奔向了柳溪河。许秀云悲惨命运的描写，无疑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给农民，尤其给像秀云这样的普通农村妇女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是邪恶势力的摧残，极“左”路线的威逼，封建习俗的歧视，才把许秀云逼上绝境的。作家在作品中赞誉许秀云是深谷里的幽兰、娴静、淡雅、素朴、高洁。但这种美，却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这也正说明，“文化大革命”10年是一个践踏人的道德美、精神美，践踏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年代。

第三，从人的思想性格、精神的扭曲变异来反映“文化大革命”给人造成的巨大创伤。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由于是整个生活经历在个性心理上长期雕琢的结果，因此它是根深蒂固的，不容易改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极“左”政治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危害，却很容易迫使人的思想性格、精神扭曲变异。这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我是谁》中的韦弥、《伤痕》中的王晓华、《弦上的梦》

中的梁遐、《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的邹宇平等人物身上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许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身上有着我国广大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俭省的特点。在合作化年代，许茂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那时他埋头苦干，爱社如家，关心群众，公而忘私，“同人们一道建设幸福的家园”。他的女儿们常常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生活的急剧变化，使许茂变了。他变得苍老，变得沉默寡言，变得自私，变得冷酷无情。大女儿病死了，他反对用他的木料做棺材；四女儿许秀云遭到不幸，他却不能理解她，原谅她，还狠心地把她赶出家门。为了钱，他趁人之危，压价买下孤儿寡母赖以治病的食油再抬价转手。他还专门跑十来里路到连云场、太平镇撕大字报卖。后来，大字报少了，他还觉得十分遗憾。许茂原先勤劳、善良的本性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一惊人的变化，固然有许茂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阶级特性所决定的，但更多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当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农村的生产一年不如一年，荒草淹没了庄稼，“社会把许茂忘掉了”，高喊着政治口号的人们，不仅不管农民的油盐柴米这些经济小事儿，而且还要不停地割他们身上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许茂作为一个人，他要吃五谷，要穿衣，要生活下去，因此，他不得不顾自己，不得不变得自私、冷酷。由此可见，正是政治风暴卷起的生活漩涡扭曲了人的形象，改变了人的思想性格。作家通过许茂思想性格的变异，深刻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在农民心灵上造成的深重创伤。

女教师韦弥在严酷的人身摧残和人格蹂躏中所产生的变